

前 言

三国鼎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历史发展的整个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朝兴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南北对峙的一再出现，而三国鼎立的局面，却是唯一的一次历史存在，可见这一历史局面的出现是一个特例。特例是历史发展中的变异，就像生物遗传工程

上变异一样，有它变异的特殊原因，而不能用“常规”的必然性理论去解释。

目前史学界已成定论的观点认为：“三国鼎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其理由是：“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这就是三国鼎立的“必然性”理论，可名之曰“经济均衡论”。史学界发表的许多论文，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各种教科书，对三国鼎立的看法都没有越出“经济均衡论”的藩篱。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长江流域已有巴、蜀、楚、吴、越等国家建立，何待于两汉以来的江南开发形成经济均衡！割据长江上流的刘璋、刘表，甲兵资实，不弱于孙吴，更不减于刘备，何以要待刘备来建立蜀汉形成曹、孙、刘三家对峙！可见“经济均衡论”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经济是基础”，任何时候这都是立国的基本条件。东汉末年的战乱，使北方经济残破，没有力量支持曹操不停顿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确是三

国鼎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曹操统一北方未久，就南下荆州，接着又东进赤壁，连续大规模作战，北方经济无法承受。吴国的朱治就说：“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乎室，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周瑜论曹操必败，原因之一是“又今盛寒，马无藁草”，也说明了赤壁之战，曹军后勤供应不继，人乏衣粮，马缺草料，乃是一种冒进。但是，当时曹操已得天下十之七、八，长江上流的益州牧刘璋遣使请降，只有区区江东 6 郡相抗，且孙权内部未靖，山越未服，南北对抗众寡悬殊，并未形成均衡。只要曹操计划周密，时机得宜，不冒进赤壁，完全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赤壁战后，荆吴之势强，刘备入蜀，三国鼎立形成，这才出现了南北经济均衡之势，对于“三分对峙”，有一定的影响，但仍不是主要的因素，因为曹魏的实力，仍大大强于吴蜀二国力量之和。尤其是蜀国这个弱小政权，远不敌曹魏，而诸葛亮居然能够屡次北伐，其原因乃蜀国所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吴蜀两国的互为犄角之援。经过几十年的对峙，北方经济恢复，吴蜀两国政治昏暗，人心反向，曹魏的人力、物力占了压倒的优势，三国也就归于一统了。经济的因素最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

们不能以此来反证，三国鼎立决定于南北的经济均衡。

三国鼎立有着多因素的历史原因，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演变才形成的。如果我们原始察终，研究一下三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便可明显地看出来。三国鼎立始于公元 220 年的曹丕称帝，迄于公元 265 年的西晋建立，前后 46 年。在西晋建立之前两年，蜀汉已亡，历史进入了晋吴两国的南北对峙。但作为有始有终，因果相连的历史时期，三国纷乱的历史，应起于公元 190 年的军阀混战，迄于公元 280 年的西晋灭吴，前后 91 年。研究三国历史，不追溯东汉末的军阀混战，就不能说明三分的由来和三国史事的因果；不讲西晋灭吴，就没有结尾。这 91 年的纷争历史，以汉末动乱三国形成时期的历史最为精采绝伦，波澜壮阔。本书着重讲三国鼎立为什么形成，从这一角度可将 91 年的三国历史划分为“群雄割据”、“三国鼎立形成”、“三国对峙并走向统一”三个阶段。公元 190 年至 207 年是东汉末群雄割据阶段，前后 18 年，从人才均势上形成了曹、孙、刘三个集团。公元 208 年赤壁之战至公元 229 年孙权称帝，是三国鼎立形成阶段，前后 22 年，三方斗争交错，内容复杂，形势发展瞬息万变，最终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

和政治均势，三国鼎立才得以确立。公元 230 年至 280 年，是三国对峙并走向统一的历史阶段，前后 51 年。第一阶段 18 年，可分为中原军阀十年大混战与袁曹火并两个段落。十年大混战，混沌一片，群雄纷争，逐鹿中原。袁绍与曹操联手，雄据北方。官渡之战，袁绍败没，埋葬了天下归一的形势，曹孙刘三个集团崛起，人才三分，孕育了鼎立的基因。第二阶段，曹孙刘三方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形成了三分地理均势，可以说是人谋的规划形成了三国鼎立。第三阶段，半个世纪的“三分对峙”，地理均势起了主要作用，南北的经济均衡作为地理均势的补充也起了重要作用。研究三国鼎立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第一、二两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可以鲜明地看出，“形成三分”实非某种单一的历史原因所决定，也并非必然要出现的局面，而是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通过无数的偶然事变，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历史的偶然又寓于必然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这种寓于必然之中的偶然是怎样引导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将复杂的历史内容规范在简单化的必然性公式模式中。

所谓“必然”，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向和客观的历史条件。东汉末年豪强地主集团的经济膨胀有很大

的割据性，必然带来军阀割据混战；反过来，割据兼并必然导致统一，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向。南北的经济均衡和吴蜀两国所依恃的地形险阻，是客观的历史条件。所谓“偶然”，是指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分鼎立的局面。这一局面是由于三分的人才均势，三分的地理均势，三分的政治均势等多种历史原因的交叉才形成的。而这些历史偶然事变，是人谋起了主导的作用，所以三国历史的特点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因而威武雄壮而慷慨悲凉。曹孙刘三家成功了，而后三家又都失败了，统一三分的是三姓之外的司马氏，真是风云变幻，气象万千，可供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正由于此，三国故事不胫而走，自宋代以来，由于平话、戏剧、小说的影响，已是家喻户晓。但戏剧、小说演说的历史，毕竟与历史事实有所区别，因此我们总结三国历史形成的原因，以及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经验教训，评价历史人物，主要应依据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注等史籍，把《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既有联系又要区别开来。中央电视台通过现代影视艺术，把《三国演义》改编成 84 集电视系列剧，走进千家万户，这对于普及三国历史知识有重大意义。

本书不仅与历史演义不同，而且与历史故事也

有区别，自然与影视艺术有更大区别。我们写的是真实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让读者了解系统的历史知识，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我们这本书，不要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主要的人和事，勾勒出历史的轮廓就可以了。行文要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为此，引文原则上用白话意译，与叙述语言打成一片。本书既要明白又要有深度，作者要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引发读者思维，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所以我们还用夹叙夹议的形式发表作者意见。

基于上述想法，本书谋篇布局，以专题形式与时间顺序交叉展开，既打破章节结构，也不按编年叙述，以突出主要的人物和事件。全书共 11 章，从汉末军阀混战起，叙事到西晋统一为止，共 10 章，最后一章集中评述经济、文化，以示三国的时代特色。具体说，本书以战争为经，人物与事件为纬，组织专题谋篇布局，故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各为专章，评说人谋活动，以曹孙刘三家为主线，追寻三国鼎立演变之迹为主题，给读者勾画一个清晰的轮廓，还三国历史本来面目。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读者从历史的高度去欣赏小说演义与影视艺术，一定会相得益彰。本书的这种结构，以及评议，仅是一家之言，是非得失，还待读者评说。

汉末军阀混战

三国鼎立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割据兼并的结果。而军阀混战则是豪强地主集团割据性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政治腐败的直接产物。因此，东汉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政治的极端腐败，以及割据集团的形成是研究三国历史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东汉统治的崩溃

公元 25 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到公元 220 年汉献帝刘协被废，东汉灭亡，历经 12 个皇帝，近 200 年。公元 190 年，关东诸侯起兵讨伐董卓，爆发了东汉末年的军阀大混战，群雄林立，东汉统治崩溃，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东汉豪强集团的兴起 两汉 400 年的统一，地主经济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东汉开国者刘秀就出身贵族官僚地主家庭。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东汉的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三十二功臣、三百六十五功臣，大多出身“世吏二千石”，或为“乡闾著姓”，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因此，东汉政权一建立，就显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它维护豪强地主的利益，造成土地高度集中。如贵族地主济南王刘康，有田 800 顷，奴婢多至 1400 多人。官僚地主郑泰，有田 400 顷。东汉政治家仲长统对东汉末豪强地主经济势力的膨胀有着生动的描绘。他说：汉朝中兴以来，豪强富人，居住着几百间富丽堂皇的深宅大院，占据了大片肥沃的土地，役使着成千的奴

婢和上万的长工。妖童美妾充满了内庭，女乐倡优排列于深堂。有的兼营商业，车船周游全国各地，屯积居奇，货物充满都邑。他们的奇物宝货堆满了巨室，马牛猪羊布满了山谷（《后汉书·仲长统传》），豪强地主不仅占有巨大的财富，而且在地方上有很大的势力，大都拥有自己的武装，有的多达二三万人。有一官半职的豪强要作威作福，没有官职的劣绅也武断于乡曲。豪强们的荣耀逸乐不亚于王侯，他们的势力显赫与郡守县令相匹敌。如果中央政权稳固，能够有效地控制豪强地主，地方经济愈发达，国家愈强大。反过来，如果中央政权削弱，国家对豪强控制失御，地方经济愈发达，愈要与中央闹独立。东汉末年就是这一种情况。

东汉末黄巾大起义，豪强地主纷纷组织武装，修筑坞壁，镇压黄巾，乘机扩展势力。公元 190 年，关东兵起，天下大乱，豪强地主各拥兵自重，率族自保，有的则作有计划的迁移，或择主而居，或占山为王。如颖川荀彧北依袁绍，后投曹操。右北平无终人田畴则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典型豪强。北方乱起，他率宗族等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当时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的黎民被迫依附强宗，沦为部曲，懂

客，壮大了豪强的力量。田畴力量壮大后，于是制定了约束部众的 20 余条法纪，“法重者至死”又制订了婚嫁之礼，学校授业之法。田畴还遣使与乌丸、鲜卑交通，使之致贡，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在全国各地林立着无数个像田畴这样的强宗豪右，他们就是东汉末军阀割据混战的社会基础。割据一方的州牧郡守，如果得不到这些地方豪强的支持，就很难立足。据有北方幽、冀、青、并 4 州的大军阀袁绍，招命田畴，又即授将军印，礼命五至，畴终不出。公元 194 年，陶谦让徐州给刘备，刘备不敢接受。后来得到下邳陈登支持，刘备才领徐州牧。但终因基础薄弱，刘备两次得徐州，两次丧失了徐州，在北方不能立足。后来他在荆州驻屯 10 余年，依靠荆州地主集团入川，又得到刘璋旧部、东州地主集团及益州地主集团的支持才建立了蜀汉。孙权得江北大族张昭、周瑜支持，特别是得到江东地主集团顾陆朱张四大姓以及全氏、贺氏等豪强的支持，才站稳江东。曹操是以颍川荀氏、沛国曹氏、夏侯氏地主集团为基干，广泛罗致北方地主集团的支持发展起来的。袁曹角逐，曹胜袁败，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像田畴这样的众多豪强弃袁投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袁曹双方的力量对比，才使得曹操由劣势转变为优势，

并在战胜之后，能够稳住局势，巩固对所占地区的统治。

东汉豪强地主集团分为两个阶层。一是世代官僚地主，史称世族地主，又称世家大族。他们世代为高官，经学传世，在中央和地方都有着坚固的势力。如汝南袁氏四世五公^①，弘农杨氏四世四公^②，颍川荀氏世为“冠冕”^③。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天下，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号召力。二是地方豪强地主，主要是大商贾兼并土地形成豪强，史称庶族地主。他们有大量的田产，奴婢以千计，但在政治上受士族地主的压抑。曹操家族是沛国谯县的大豪强，属于宦官集团的大官僚，其父曹嵩曾官至太尉，但仍是庶族地主。所以曹操在政治上的号召力不如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袁绍、袁术兄弟强，初起时不能与二袁匹敌。二袁利用他们的政治号召力，在东汉末最早萌动了觊觎汉室之心，成为祸首，这是他们在政治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曹操、孙权、刘备都是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大乱初起时他们还想扶持汉室，建立功名；后来看到

^①《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华峤《后汉书》，汝南袁氏，袁安、袁敞、袁汤、袁逢、袁隗五人，经历四代，均居三公之位，故曰四世五公，或曰四世居三公位。

^②据《后汉书·杨震传》，弘农杨震，震子杨秉，秉子杨赐，赐子杨彪，四人历四代，均居三公之位，故曰四世四公。

^③颍川荀氏即曹操谋士荀彧、荀攸家族，世代为高官，知名当世。

汉室不可复兴，仍然各自打着效忠汉室的旗号收揽人心，终于鼎立三分。此外，士族地主集团多谋士，庶族地主集团多武将。士族地主军阀排斥庶族地主，他们手下缺乏能征惯战之将，军队战斗力不强，在混战中极易被消灭。曹孙刘三家都以庶族地主和平民出身的战将为骨干，又广延士族智士，得到两个阶层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所以在混战中越战越强，刘备更是屡仆屡起。认识东汉末豪强地主集团的割据性，把握两个阶层的军阀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极端腐败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是导致军阀混战的直接原因。东汉政治从第四代皇帝和帝起就开始腐败，外戚宦官轮流专政，而宦官专政则是腐败的集中表现。和帝即位，年仅 10 岁，养母窦太后临朝，其兄弟窦宪、窦景等，并居机要，专权自恣。窦氏一门贵盛，其子弟亲戚，飞黄腾达，所受赏赐，使东汉王朝“仓帑为虚”。和帝长大，依靠宦官郑众诛杀窦氏，郑众因功封侯，参预政事，宦官势力开始抬头。和帝以后，太后贪权，几乎后继皇帝都是幼年。皇太后临朝称制，依靠外戚掌权，小皇帝长大，依靠家奴宦官杀逐外戚，夺回权力。东汉后期外戚、宦官轮流专政，就是这样演出的。桓、灵二帝相继为诸侯入继大统，他们不信任朝官，更加依赖宦官，前有

“五侯”，后有“十常侍”，宦官专横达到极点，不仅杀逐外戚，而且又屡兴党狱^①，打击士族地主，海内涂炭二十余年（《后汉书·党锢列传》）。宦官子弟党羽，布列州郡，与盗贼无异。他们随意掠人妻女，夺人田宅，草菅人命，无恶不作，逼得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

桓帝时，外戚梁冀专权，任大将军，他侵占京师洛阳周围近千里的地方作为私人林苑。林苑中有一处占地数十里的“兔苑”，有人误杀了苑中的一只野兔，10余人遭株连被杀头。梁冀掠夺受贿的钱财多达30余亿。梁冀倒台，家财被籍没，相当于东汉政府当时一年赋税收入之半，由此可见当时政治的黑暗。

外戚是靠裙带关系专国，一心谋取的是皇亲国戚这个小集团的利益，所以窦宪、梁冀等专权误国，终被诛灭。宦官本是一群不学无术的皇帝家奴，他们深居宫中，与世隔绝，“不知稼穡之艰难，不恤征伐之劳苦”，至于治国良策更是盲然不知所以。宦官在宫廷糜烂生活和皇帝淫威的熏陶下，养成了阿谀皇

^①党狱：即下文钩党之狱的省称。宦官诬陷士大夫官僚共为部党，拉帮结派，反抗朝廷，逮捕党人严刑拷打，互相牵引株连，兴起大狱，故称钩党之狱。党人入另册，禁锢终身，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所以又称党锢之祸。

帝，崇拜权势的品性。他们只争自己的权利得失，哪管什么国计民生，所以宦官专权，更为黑暗。桓帝依靠宦官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 5 人诛杀梁冀，5 人同日封侯，世谓之“五侯”。单超不久死亡，其余四侯极为横暴，他们“竞起第宅，以华侈相尚”。兄弟、姻戚遍布州郡，充当地方长官，大肆掠夺，民不堪命。老百姓痛恨他们，加上外号，编出顺口溜，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意思是说，左悺权势之大，有回天之力；具瑗专横，没人敢与他平起平坐；徐璜像只母老虎；唐衡祸毒像一场大雨流遍天下。灵帝时宦官张让、赵忠、封谡、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璜、夏惲、郭胜等 10 人为中常侍，朋比为奸，蛊惑圣心，灵帝竟然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中常侍侯览家在山阳防东，残暴百姓，侵夺民宅。他霸占民田 118 顷，民宅 381 所，公然仿照皇宫修建了豪华宅邸 16 区，每区都有楼阁、亭台、池塘。他还公开掳掠妇女，发掘坟墓掠取宝物。他的哥哥侯参做了益州刺史，倚势搜括金银、锦帛、珠宝 300 余车，钱 1 亿。如此贪残的宦官专权，不仅广大人民受到更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统治阶级本身的大多数也遭压迫，堵塞了一些太学生的仕途，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

宦官专政，只代表一小撮凶狡人的利益。正途仕进的士大夫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耿直派官僚和一些太学生联合起来抨击宦官，议论朝政，有的利用手中权力狠狠打击宦官。如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县令，贪赃枉法，逃匿张让家中，司隶校尉李膺派人从张让家中将张朔缉拿归案处死；山阳太守翟超，籍没中常侍侯览“资财”，东海相黄浮收拿中常侍徐璜兄子下邳令徐宣，治罪弃市，暴其尸。宦官向桓帝诉冤，指使人诬告李膺等“共为部党，诽讪朝廷”，从而制造了遍及全国的大冤狱，史称“钩党之狱”。公元 166 年，桓帝延熹九年，第一次钩党之狱，李膺等 200 余人下狱。公元 169 年，灵帝建宁二年，第二次钩党之狱，钩连牵引，遍及全国，无辜受害者成千累万。史称，凡“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送，亦罹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这仅仅是京师诏狱拷治的人数。这次党狱波及全国，“时诏书下举钩党，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青州六郡，五郡有党人。只有平原郡，因平原相史弼舍命保护，抗旨不报，“济活者千余人”。由于民众保护党人，于是出现了“一人逃死，祸

及万家”的惨况。张俭逃亡，展转株连，布满天下，“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后汉书·党锢列传·张俭传》）。宦官何以有这样大的能量，使全国成千累万的无辜者被指目为党人而惨遭杀害呢？只因“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侧”（《后汉书·史弼传》）也就是皇帝旨意要制造大冤狱，调动了整个国家机器，海内生灵，在劫难逃。

单从权力斗争来看，钩党之狱是东汉政局长期动荡的总爆发。东汉政局不稳是由于外戚、宦官、士大夫三大势力互斗不已。外戚借太后之力专国，宦官假皇权以肆虐，士大夫标榜清流自重。所谓清流就是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的正途仕进。这三大势力实质上代表着太后、皇权、相权 3 种力量，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秦汉专制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外戚、宦官好似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一对毒瘤。秦汉中央集权，加重君权，对于巩固全国统一、发展经济和繁荣共同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皇权过重，它又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以意为法，权落群小的弊端。太后、皇权、相权，3 种权力平衡，国家政局稳定；失去平衡，政局动荡。3 种权力的关键是加重相权，使皇帝、太后受到牵制，依照封建制度的